

一个通向世界的码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阶级的选择——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多的地方。在100年前，上海大约有100万产业工人，基本上占到了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半。”日前，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何建明系列党史课”的首讲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动情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的故事。

在何建明看来，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还与当时的时局和各个城市的特点有关。

“上海的小弄堂、小阁楼，对当时弱小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工作起了很大的贡献。”何建明进一步分析了北京、广州、哈尔滨三个城市与上海相比，为何不具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优势。

在老北京何建明看来，一个世纪前，北京的建筑大多由四合院组成，外墙奇高、戒备森严，极不利于开展地下工作。李大钊被通缉后，躲进了俄大使馆的一座废弃的王爷大院里，但第二天就被奉系军阀知晓，发动300人，将其团团包围；不久，中央派了极富地下工作经验的中央候补委员王荷波前往，又被抓捕。

“再看广州，虽然和上海一样面对大海，但是太近，而上海距离海洋有一定距离，是内海城市，加上国民党的总部也在广州，他们绝不会让共产党掌权和成长。而哈尔滨，共产国际的组织就在不远处的海参崴，但当年国际共运负责人维经斯基一去哈尔滨就被捕了。所以，只有上海最合适。”何建明发现，中共一大代表中，大多数人都是江浙一带人士，有着天然的地缘亲近性，而且上海腹地开阔，信息便捷，海派氛围浓厚，也是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党的领袖陈独秀易于发挥特长所在地。

上海那些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细密交错的弄堂和层层叠叠而起的小阁楼，正好为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的掩护。何建明曾实地走访过虹口区山阴路一带的弄堂，中共江苏省委旧址也在那里，“石库门多为三层楼房，有多个出入口，里弄更是四通八达。

选在这里召开会议，紧急情况下，地下党组织也便于撤离”。

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搜捕和屠杀。这一时期，周恩来负责上海的地下工作，他创建并亲自领导“中央特科”，在隐蔽战线上保卫党中央安全，惩奸除恶。

不过，我党最早的情报、保卫专业机构——特务工作处其实是在同年5月成立于汉口。当时，上海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鉴于这次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周恩来倡议并于汉口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标志着我们党隐蔽战线工作的专门机构开始萌芽。

“特务”本意是指执行特殊勤务、特别任务的人。彼时的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事部，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其下设保卫股、情报股、匪运股和特务股。其首要任务就是保护位于胜利街的中共中央机关。当时，蔡和森、李维汉、周恩来、瞿秋白等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研究工作。

特务工作处的工作人员往往拥有国共双重身份，情报来源多种途径，并且成效十分明显。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处及时得到情报，使陈独秀及中央所有成员成功避开国民党的搜捕。随后，八七会议召开，特务工作处精心安保，使国民党警探对鼻子底下的“惊雷”一无所知。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特务工作处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使命。虽然只活动了3个月，它却培养了中共最早的特工干部，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但周恩来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创建专门的工作机构，他向党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1927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科，以原武汉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的李强等同志为骨干，又吸收了上海地下党的一些同志，由周恩来亲自指挥。

上海那些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细密交错的弄堂和层层叠叠而起的小阁楼，正好为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的掩护。